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反拨。德国浪漫派先驱、反启蒙运动的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总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一般和揭示存在的本质,但“概念和范畴都是一般性的,必定不能涵盖那些非常之物,那些特殊之人的特别之处”。由此哈曼的观点是,我们的生活像一道水流,如果运用一般性的概念或范畴截断它来加以分析和把握的话,必定会使得生活之流支离破碎。不仅如此,激进的浪漫主义者如卢梭甚至进而质疑人的理性能力,主张相对于所谓客观的理性分析,自然流露的强烈情感或直觉更能把握事物本质——浪漫派诗人济慈的名句“(牛顿光学)将天空的彩虹拆解”最能表达这一情绪。而作为理性主义衍生物的科学(主义),理所当然也成了浪漫派猛攻的靶心。

与上述浪漫派观点不同,诗人雪莱(1792—1822)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英雄时代和虔信时代,而是科学技术引导社会进步的时代,因此主张通过科技手段改进民生福祉。雪莱本人一向热爱科学,他曾自负地宣称,假如他选择不做诗人,一定会成为当世一流的化学家。与此同时,他又强烈反对启蒙运动对自然科学的过度崇拜,导致科学技术的力量被滥用,从而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化学家中的牛顿”

针对当时盛行的科学机械论,雪莱选择自然为突破口来表明浪漫派的主张:自然是机器的整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自然这一生命体中存在科学无法分析的东西,与其依赖抽象的分析,不如信赖审美的直觉。与之相应的是柯勒律治提出的有机整体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与自然万物一样自发地生长,自然与艺术并非对立,而是融为一体。两位诗人都坚信人是精神(或灵魂)的完整存在物,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碎片存在物——像早期浪漫派诗人布莱克哀叹的那样,“由于人类的堕落,由于毫无想象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人类灵魂杀手的邪恶工作,人类精神已经石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到19世纪初期,科学俨然已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与人文之士的分歧对立也日渐加深。然而雪莱却寄望于熔科学与文学于一炉,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雪莱在诗歌、散文以及诗剧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大量运用科学意象和研究成果,说明他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比如,他在抒情诗《云》中,对云、雨、雷电、海洋与天空等自然现象与过程的刻画极富于科学精神——同时指明宇宙具有不断地变化和自我复苏的能力。他在名诗《西风颂》中对海底树林在洋流变化之前自行卷缩现象的描绘,也符合科学原理。《含羞草》一诗则把雪莱精于观察事物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准确地描摹了植物园里一年的自然循环,将植物学知识和人类感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此外,雪莱在名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对新兴的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多有提及,尤其是最新的有关恐龙的理论。他不仅诗意地描述月相的变化、月震现象、地球和月球因引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而相持、粒子围绕彼此千万次旋转而产生各种波长的辐射等自然现象,同时还大量引用拉普拉斯、尼科尔森百科全书和托马斯·特罗特等科学家的著述,以支持他有关地球黄道最终消失等科学假说。

浪漫派一向主张,人类的智能存在分析和综合两种主要倾向。雪莱认为科技属于前者,而诗的想象为后者。雪莱在《麦布女王》中有大量科学引用,探讨自然科学发现以及人的自我认知,包括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物性论》、培根《道德政治经验论》、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和卡巴尼斯“人的物质精神同一说”,等等,其中不乏令后世惊叹的真知灼见。比如他在《麦布女王》(第6章)注解中写道:“天文学教导我们,地球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两极和黄道每年都变得愈来愈垂直……热带所有生物的骨骼在西伯利亚的北方和俄亥俄河岸上被发现。在德国中部发现一种植物的化石,这种植物只有在今天印度斯坦那样的气候条件下才能生长……古代作家的证据表明:英国、德国、法国在过去比现在要冷得多,其中的大河每年都会结冰。”

正因为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雪莱的诗篇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主要的自然知识领域。比如,在前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诗中,作者不仅诗意地描述了月相的变化、月球上的山脉、月球始终

浪漫诗人雪莱： 寄望熔科学与文学于一炉

杨靖



雪莱

对于完全切断诗的智慧 and 科学智慧的联系,雪莱则留给世人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心灵参加的逻辑活动是刻板、片面和危险的。对于内在世界而言,它将导致情感世界的萎缩,破坏人自身的生命深处的内在自然,使人失去独立完整的人格,甚至败坏人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无羁和肆虐无可避免地引起价值和事实的分裂,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随着人类对自己技术想象力的产物失去控制,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奴役。

自己也成为一名奴隶”。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终身的科学爱好者,雪莱始终对所谓的科学精神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伪科学的统计数据以专断的姿态阻塞想象力的活动空间,并以貌似有理来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判断。雪莱曾明确表示,包括伦理道德的“诗性智慧”如果不能指导科学,则这一利维坦似的巨兽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实用科学与人类“崇高的天命”

在所有自然学科中,雪莱对化学和天文学最有研究。1820年,他在“给玛利亚·吉斯伯恩的一封信”中,谈及其子亨利·雷弗利(时为蒸汽船工程师)化学实验室的场景:他的螺丝钉、圆锥、车轮等物散落一地,旁边都是一些关于数学列表和古典化学方面的书籍——“到处是瓶瓶罐罐,烧杯量筒,以及各种不可思议的木器”,并表示这一场景“相当震撼”。雪莱本人中学时代对物理化学尤感兴趣。1810年他在伊顿时,曾用树枝点燃火药和玻璃瓶,“烧死魔鬼和(矿物学)老师”!

当时,伊顿的自然哲学(科学)老师是科学家亚当·沃克。沃克的科学讲座日后出版,是一本厚达五百页的四开本巨著,内容涵盖了天文、静电学、力学、化学以及大气、光和磁等自然现象。沃克在课堂上谈论行星轨道,令雪莱热血沸腾。沃克的很多课堂实验让雪莱激动万分,因为同他的反叛精神极为合拍。课后,他自费购买太阳仪和光学放大镜(后被典当),开始进行化学实验。

除了沃克,雪莱的科学热情还受到他在伊顿时的科学导师詹姆斯·林德的影响。皇室医生和皇家学会会员詹姆斯·林德是蒸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的密友,他退休后住在温莎城堡,当时是伊顿

公学的一位兼职教师。对少年雪莱而言,林德是科学睿智的模范,也是他科学之路的“燃灯者”。雪莱后来曾说:“我亏欠他很多,啊!远胜过我亏欠父亲的。他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那长时间的交谈,他在其中显露了最仁厚的宽容和最纯洁的智慧的精神。”林德精研天文学和气象学,曾在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上发表过关于金星凌日和便携式风速计的文章。林德对动物电和电休克实验也非常感兴趣,在私人通信中,林德曾建议通过电击来治疗英王乔治三世的疯癫(这一点对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创作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林德同当时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往来互动,由此雪莱得以间接接触到很多科学家和科学进展,比如化学家戴维及其科学发明。

日后在与好友托马斯·杰弗逊·霍格的通信中,雪莱说:“凭借化学的力量,哲学家可以改天换地,把贫瘠的区域变成丰饶之地——那干旱的非洲荒野将因为充裕的供水而焕然一新,也可能被立即转变为肥沃的草场,或无垠的玉米和水稻田。”对于雪莱、戴维等有识之士而言,人类那“崇高的天命”,都是在科学技术的“效用”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健康结合。这是一种渐次改进与“辉煌时刻”的结合,一个科学的能力和诗的视野完美结合的世界,而不是虚幻的天堂。1819年,在参观了雷弗利的铸造工厂后,雪莱一度打算在雷弗利“唐·璜号”蒸汽渡船工程上进行投资,可见他对推广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兴趣之浓厚。

科学与诗歌的“视界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雪莱对伽伐尼和伏特的电学争论一向饶有兴趣,对戴维、法拉第师徒的电动原理也较为熟悉——正是当时动物电以及人体电的假说引发了他对于生命奥秘的探索。早年在伦敦圣巴托洛缪医院聆听医学讲座,曾立志行医济世。“在我们死后,灵魂会不会在另一个星球游荡?”这一疑问时常令他困惑不已。雪莱认为生命是一大秘密,死亡才是揭开这个大秘密的唯一途径;死亡是一种解脱,一种能接近真理、回归到宇宙灵魂的最佳路径。雪莱反对宗教教条主义的“意识和物质的流行哲学”,这在他的《论生命》中有所体现。自然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他而言犹如古老的“巫术”,生命的秘密激发他的想象,他渴望找到“哲人石”,梦想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这是雪莱的浪漫幻想,但在他的妻子玛丽·雪莱的笔下,这一浪漫幻想与科学实验相结合,从而成就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一个促使玛丽·雪莱对科学的作用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因素则是丈夫雪莱的影响。雪莱并不认为上帝创造生命的观点,直接启发了女作家对生命科学问题的思考: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旅行,也是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的组成部分。灵魂似乎和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或者量子纠缠等密切相关——正如雪莱在《论来世》中所说:“这些物质都会变化、腐朽,都会转变为其他的形态……降临世间之前我们可曾存在过?这种可能性颇难想象。每种动物或植物的繁衍都有一种可变其周围物质为一种自身相似物的力量。这是一种规律,也就是说,某种基本物质粒子之间的一种关系经历一种变化,这些物质粒子最终会重新组合。”

日内瓦大学现代历史教授、科幻文学专家米歇尔·波莱在《弗兰肯斯坦,启蒙哲学的悖论》一文中曾指出:“像弗兰肯斯坦制造的生灵一样,卢梭所称的‘野蛮人’,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旦与社会交往,他会因掌握知识而败坏。若说个人可臻于完善,人类历史上每有进一步进步,接踵而来的却是倒退。一切改进都造成环境等方面的恶化,导致社会不平等显现,科学与艺术一味前进,必然带来风俗的衰败。”这也是雪莱的隐忧:他一直认为科学是中性的,既可以用于社会改进,但也可能被滥用,从而阻碍人类进步,因此主张警惕“疯狂的科学”,并倡导科学与诗歌的“视界融合”。正如德国浪漫派诗人歌德所说,“科学源于诗歌。当时机成熟,二者会再度重逢,一同跃入更高的境界”——这是雪莱的理想,也正是他在《麦布女王》中描述的当“幸福与科学终于在地球上出现”时的美好景象。恩格斯曾赞誉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而这一美好景象可能是浪漫派诗人雪莱最重要的科学预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

学术速递

栏目主持:韩天琪

吕世荣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康德哲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可以说 是其所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因为它开启了对“理性”这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的直接批判。同时,康德哲学是在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危机和认识论危机的思考与回答中形成的,这意味着“哥白尼式革命”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具有重构形而上学世界和内在价值取向的意义。然而,这一革命的局限性也正在于先验地将“理性”作为考查问题的根据,意图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对时代的哲学课题作出解答,最终由于对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隔而未真正脱离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由此从根本上忽略了实践活动在认识问题以及传统形而上学中所关涉的自由等问题上的根基作用。

——《从认识论到形而上学: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及其意义》,载《世界哲学》,2019年05期

刘国瑞

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形成与演进,深受经济社会重大转型以及国家重大战略调整的影响,既体现了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明显的国情特点。随着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交叉布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因素更加复杂,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难度更大。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力量和制度活力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的决定性力量,以及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在价值、形态等层面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对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需要有新认识、新思路和新举措。

——《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演进特征与发展趋势》,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09期

邢来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德意志帝国时期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剧烈碰撞,形成“现代化危机”。传统乡土作为人们童年记忆中的安全之地,成为他们躲避“现代化危机”的本能选择,由此催生了精神文化和社会领域上回归传统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可以说,回归传统乡土就是人们用来化解“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回归传统乡土不仅给怀念前现代乡土生活的人们以精神慰藉,使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得到一定的保护,而且促进了德国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传统的形成,对于德国构建和谐合理的传统与现代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归乡土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载《历史研究》,2019年04期

魏戈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

实践性知识是教师真正信奉并在其教育教学中实际使用和表现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以“研究旨趣”统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的演进脉络,发现西方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发端以来,经历了分析—理性取向、个体—经验取向、实践—反思取向、社会—文化取向等四重旨趣变迁。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整体系统性、动态生成性与社会文化性,将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突破点,以此增强我们对教师工作及其专业属性的再认识。

——《西方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旨趣变迁》,载《比较教育研究》,2019年10期

陶水平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德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其《重构美学》一书中对西方美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给予了学术图绘与构想。韦尔施认为,在当今西方后现代社会,“审美化”(感性化)已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其根源在于“认识论的审美化”。因此,韦尔施主张回到鲍姆加登感性学的基础上重构美学,建构一个公正对待人类生活全部感知领域的超级感性学,或曰超越狭隘艺术领域的“超越美学的审美”。韦尔施的后现代美学重构有了一定积极意义,但存在严重偏颇,应代之以感性学,以感性学重构中国当代美学,从感性学美学走向感兴学美学。中华“感兴学”之“感”包含了韦尔施感性学对感性活动的重视,而中华“感兴学”之“兴”更具有韦尔施感性学所不具备的审美升华和审美超越。创新和发中华感兴学美学是一条极有希望的中国当代美学重构之路。

——《从感性学走向感兴学——“美学重构”的新路径》,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华东师范大学发布《子藏》“兵家部”

——专家学者研讨“《子藏》学”

■本报记者 黄辛

11月2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子藏》第五批成果发布会暨古籍整理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和各高校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见证《子藏》第五批成果的发布,并围绕古籍的整理保护与研究、“《子藏》学”的建构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表示,期望《子藏》成果的连续发布和“《子藏》学”这一新概念的进一步提出,能够在凝练文化成果的同时,传承经典,有益士林,为学界做实事,为文化建设开风气。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对《子藏》工程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介绍,并对“《子藏》学”这一创造性新概念进行了初步解读。他说,本次《子藏》成果发布会发布《子藏》“兵家部”,以“求真且全”的原则收录中国古代兵家典籍《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武侯书》《李卫公问对》各种版本总计438种,整合成精装16开55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子藏》工程历时十年即将完成,预计总收书近5000种,整合成精装16开本1300余册出版。《子藏》项目的宗旨,不只是古籍文献的整理,更是要通过子学边界的重新界定、子学文献的整体梳理与出版,推动子学从两千多年来“隐”的状态重

新进入大众视野,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再构,以子学精神重塑中华文化自信。

方勇告诉《中国科学报》,“《子藏》学”概念的提出,是对《子藏》文化价值的深入发掘。通过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子藏》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领域的开拓探索,子学力量的凝聚将为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的寻求贡献力量,在未来文化地理板块的重新确立中发出子学的强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在高度肯定《子藏》编纂团队的辛勤工作和十年来所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认为《子藏》项目提要撰写、“《子藏》学”理念的倡导等对《子藏》价值的多层次开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精神。“在经济、政策、技术等7个有利条件的保障下,中国古籍保护工作正处于黄金发展时期,中国古籍如何‘完整地’保存下来?”

张志清认为,只有通过古籍的全国性普查,海外存藏、历史信息、外译典籍的充分调查,古籍的数字化、影像化和影印出版,形成图书馆系统的古籍公布、揭示、保护,加以学界的整理研究,出版界的精品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界对思想文化的梳理四合一体的完整古籍保护运用体系,才能让经典古籍在当代社会真正实现其文化传承和价值引

领的作用。

《子藏》近于《四库全书》的体量,真正实现了“再造一部大典”的壮举,《子藏》的编纂和“《子藏》学”概念的提出,为古籍再生性保护和学术化的研究利用提供了良好示范,期待这一部大典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再构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惠美表示,《子藏》的出版为台湾学者的子学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是嘉惠学林的功德之事。她介绍道,“新子学”理念在台湾学界已经引起热议,明年第九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台北举办,并热情邀请大陆学者和博士生参加。

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小白以《开辟子藏学研究新局面的思考》为题,对“《子藏》学”在子学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加强“《子藏》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研究思路、改善主体学术修养等进行了探讨。

作为一个全新领域,“《子藏》学”的建构与展望成为本次大会的特色议题。如什么是“《子藏》学”?如何认识“《子藏》学”在当下的价值?它有哪些核心的议题?其研究可以从哪些路径展开?来自中文、历史、哲学、古籍整理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各抒己见,对这个“新子学”背景下的全新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